

主编:管益忻
常务副主编:启文
副主编:白卫星
学术支持:
齐桓仲父大战略研究院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学术顾问: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全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园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李新泰 刘诗白 刘 伟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国有 张曙光 张晓仙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第 252 期 (总第 358 期) 2018 年 5 月 21 日 星期一 投稿邮箱:jixzb@163.com 本刊订阅方法: 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 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中国品牌一定要关注绿色产业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首任院长 李晓西



首先热烈祝贺 2018 首届中国品牌发展论坛召开, 祝福前来参会的汽车等各类企业家们大展宏图, 走向未来。中国汽车等行业走向世界需要形成世界公认的中国品牌, 我也感谢会议主办方搜狐的邀请。

我不是研究汽车品牌的学者, 今天发言有点诚惶诚恐。但我确实与汽车还有些历史渊源。根据未证实的消息, 我父亲曾在抗战的时候开过汽车, 过云南腾冲大桥的时候差点牺牲在日本飞机的炸弹下面。我见过我父亲上世纪 40 年代在玉门一带驾着汽车找石油的照片, 以后我父亲也专门检修修过的汽车。我们单位运输公司的车有上千台, 都是打稻机、拖拉机。我小时候最喜欢闻的就是汽油那个味, 但现在不是了。

下面我就绿色产业和汽车产业的绿色发展发表自己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

首先, 汽车行业创造中国品牌一定要关

注绿色产业的发展。

绿色产业是在经济、金融、建设、交通、物流等方面高效利用资源的产业形态, 其产品不仅可以满足人类社会物资方面的需要, 也能实践对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影响的最小化。中央十分重视绿色产业的发展,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发展绿色产业的具体利用有节能环保产业、重大节能工程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新型能源, 新装备新型电网,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交通。相对绿色的交通体系, 基础设施以及和农业相关的生态农业, 森林旅游等。

在中国制造 2025 年中, 提出了全面推行绿色制造。绿色产业的发展不仅对社会有意义, 对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比如, 绿色投资的产品在出口的时候有利于打破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绿色项目有利于变废为宝, 实现资源的再利用。投资技术先进、效益好的节能项目和环保项目, 有助于提

高企业效益, 规避环境风险也有助于规避金融风险。绿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工业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 甚至绿色理念也有助于企业自身减少浪费, 进而减少成本开支等等。

第二点, 我想谈的是汽车行业创造中国品牌, 离不开能源绿色化这个基础。

我曾经主持完中国一个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委托交办的一项关于能源战略的一个课题, 我们提出了一个节能绿色结构安全改革的五指合拳的能源战略。

节能减排增效作为我国能源战略的首要选择是重中之重。能源的绿色战略是加速经济转型, 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 是能源战略的灵感。能源结构调整与优化是实施战略的关键环节, 是可持续能源体系得以实现的途径。保障能源安全是能源战略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目的, 是能源战略的主题动力和标准。能源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也是能源战略的体制保障。

能源战略的五个部分相互联系, 相互促进, 相互作用, 形成了五指合拳,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比如说人人常常把石油对外的依存度高低看成是能源安全的标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安全战略背后还有着节能结构绿色等战略的支撑, 这就是辩证的关系。

显然, 汽车的制造与使用均与能源有关。根据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要求, 各地从新车的标准准入, 用车环保管理, 车用燃料改善等方面要采取措施, 以降低机动车的尾气污染。同时要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使用。

在 2015 年环保部发布的《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中的数据显示, 我国已连续六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的第一大国, 机动车污染已成为我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所以能源机动车尾气污染问题需要防治, 这是关系到中国能不能树立自己的中国品牌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点, 汽车行业创造中国品牌, 创新与运用绿色科技是关键。

不能是节能绿色安全结构均离不开科技的支持, 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引导。作为本次大会支持单位之一, 首都科技发展研究院的代表, 这里我想略微展开讲点科技作用。一个半月前以前我在钓鱼台参加一个论坛, 一个报告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领先的电动汽车技术和电动汽车的制造大国。在过去的两年里, 中国一直引领世界电动汽车的生产。2016 年, 中国总计生产了 37.5 万辆电动车, 占全球总量 43%。2017 年, 电动车的产销分别达到 79 万辆和 78 万辆。工信部的苗部长他在报告中说, 2017 年底, 电动车平均充电一次就可

以行驶 300 公里, 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我在汇丰集团的一份报告中看到了它把电动车和内燃机车进行了比较, 很有意思, 它说电动车具有显著的优势, 内燃机靠着一连串的受控爆炸, 电动机则主要靠磁场, 内燃机需要汽车活塞和油泵, 电动机不需要复杂的传导机制, 不需要变速箱, 但是电动机要依赖充电和蓄电的能力, 必须依靠电力供应网络。虽然电动车有助于减少城市的空气污染, 但却无法减少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太阳能很好, 风能很好, 但是储电与分子负荷问题并不能解决, 运输成本也要考虑。当然如果无人驾驶的汽车能够自动充电, 并在午夜用电量最低的时候能自动充电, 确实能提升大家使用的积极性, 但是需要技术创新。看来很多技术需要有多方面的大突破。

有科学家就提出, 工业的绿色发展与工程科技创新要结合, 要推动五大引领型重要工程, 包括: 节能环保系统集成优化工程、绿色工艺改造产品创新工程、绿色产业生态链接工程、信息化大开放提升改造工程和工艺装备优化提升工程。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较长的时期以内, 完全取代化石能源是不可能的, 发挥行业潜力, 争当优秀企业绿化传统, 创新未来是我们今天会议的目标, 更是我们的期待。

“中国制造”对美国就业岗位的创造效应

王孝松

2018 年以来,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 发展到 4 月上旬, 摩擦不断升级, 两国纷纷列出增税清单, 贸易战一触即发。美方挑起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便是特朗普及其内阁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减少从中国的进口、扩大美国出口来维护国内就业。但事实上, 对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源和生产要素跨经济体配置的国际贸易来说, 传统贸易理论所假定的“出口创造就业, 进口减少就业”已不再完全适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在国际分工层面展现出一个重要特征, 即产品的生产过程包含了众多工序, 被拆分到不同国家进行, 从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当代国际贸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由货物贸易转变为任务贸易 (Trade in Tasks)。实际上, 这种国际生产分工起源于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战略, 在生产工序不断国际化的推进下, 生产分割开始盛行, 商品生产过程被分为不同的环节, 这些生产环节分别部署于世界各地, 各个环节可能由一个企业完成, 也可能由多个企业共同完成, 这被称为全

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延伸和融入价值链中的产品种类不断增加, 在为参与者创造就业、增加收入的同时, 也导致以传统的“贸易流量”为标准所统计的贸易数据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 按照传统方法进行贸易统计已造成“所见非所得”的严重偏差。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使货物在实现最终消费之前, 大量以中间产品形式在全球各地流转。根据笔者的估算, 目前世界中间产品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的 56%, 服务贸易的 70%。海关统计数据表明, 加工贸易出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中国出口商品中的大部分, 通常只是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作最后的加工或装配, 例如中国出口的计算机中就包含进口的芯片、存储器、驱动器、键盘、软件等。因此可以说, 中国的出口实际上是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出口。然而根据现行国际贸易的统计原则, 贸易规模是由海关的进出口量加总而成的。因此, 传统的中美贸易统计指标只计算了从中国出口的产

品总额, 忽略了其中可能包含的中国从其他国家和地区, 包括从美国进口的中间产品。正是这些中间产品进口, 将相关国家和地区对美的出口转移给了中国, 造成了中国出口额激增的表象, 加剧了中美贸易冲突。正如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所说, 将出口商品的价值全部归总于最终出口国, 其带来的统计偏差将曲解双边贸易失衡的实质, 带来误导并导致贸易争端。

在中美制造业贸易中, 人们看到的通常仅仅是“中国制造”, 而忽略了“中国制造”中的美国含量。这些“美国含量”既包括“中国制造”的最终产品所含的美国中间产品, 也包括产品在美国最初的设计环节、最终的销售物流环节, 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产业升级等。所以, 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制造”产品从生产、流通及研发等多方渠道为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 然而这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为考察中国制成品出口对美国就业正向拉动作用的具体途径, 笔者计算了中国对美国制成品出口中来源于美国的中间产品成

分, 发现中国制成品中的“美国含量”随制成品技术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在 2007 年至 2016 年期间, 全部制造业出口中“美国含量”平均为 1% 左右, 其中高端制造业的“美国含量”平均为 1.8%。在此基础上, 利用美国就业需求矩阵中的就业-产出比率, 笔者计算出不同行业制成品中美国中间产品为美国各行业分别带来的就业机会。定量分析结果表明, 这些中间品在 2007 年至 2016 年十年间为美国创造了 180 万的就业岗位。

通过进一步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出口, 对美国总体就业、制造业就业以及贸易运输等服务类就业都存在正向的拉动作用; 而美国对中国的制造业出口, 虽然对美国制造业就业有微小的促进作用, 但对其总体就业和贸易支持类服务业就业有较大负面冲击。具体来说, 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出口每增加 1%, 美国总体就业、制造业就业以及贸易运输与公共设施服务业的就业量分别增加 0.21%、0.01% 和 0.20%; 而美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每增加 1%, 虽然带来美国制造

业就业量 0.002% 的增加, 但其总体就业和贸易运输与公共设施服务业就业量分别减少 0.24% 和 0.25%。因此, 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出口非但没有对美国就业产生压力, 反而对其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不同于传统思维的是, 这些就业是美国通过从中国进口而得到的。更准确地说, 这些数字意味着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出口为美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需要指出的是, 笔者估算的仅是以中间品形式存在于中国制成品中的“美国含量”及其对美国的就业拉动作用。事实上, 还有很多成分存在于产品的最初设计和最终在美国市场的流通环节上, 而这些又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

综合以上分析, 中国对美出口实际上为美国劳动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我们需要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考虑当今国际贸易, 从而有力回击美国以保护本国就业为由而挑起的贸易争端, 为化解贸易摩擦、打赢贸易战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武器。

创新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

刘元春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重大举措, 在过去 5 年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新时代做好宏观调控工作的根本遵循。

新时代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提出新要求

习近平同志在 2017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 基本特征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 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提出了新要求。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传统宏观调控提出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对传统的以经济总量和速度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提出挑战。传统宏观调控对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经济总量增长问题十分有效, 但对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显得力不从心。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聚焦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 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经济发展环境变化要求重新审视和把握

我国经济发展规律。

进入新时代, 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 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 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动能转向新动能。这说明,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 经济发展规律也随之发生变化。宏观调控不能再简单盯住经济增长速度目标, 而必须将重点放在打造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提高发展质量上。

经济领域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要求调整宏观调控理念思路。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虽有总量性、周期性问题, 但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供给侧, 表现为供给质量不高、结构不均衡、市场出清困难、发展动力不足。传统宏观调控侧重于短期需求管理, 不仅不能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反而可能使这些问题恶化。因此, 突破短期需求管理框架, 更多转向供给侧, 更多采用结构性工具, 加强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政策协调配合,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创新方向。

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要求全面提高宏观调控战略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要求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这一战略安排, 要求突破“宏观调控主要是逆周期总量调节的短期调控”的西方教条, 克服宏观调控短期化困境, 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不断创新各种政策工具, 使宏观调控在目标、手段、工具以及实施模式上与国家战略规划相匹配。

经济环境复杂化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宏观调控不

仅要关注稳增长, 而且关注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 不仅要调整一般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 而且要从制度层面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因此, 过去“工具与目标匹配”的分类治理方法难以从根本上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统筹各项目标、形成调控合力。只有进一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才能超越部门局限, 突破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约束,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新实践推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 在宏观经济领域不断推进改革创新, 保证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添了重要内容。

5 年来, 我国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宏观调控思路的调整、宏观政策工具的创新以及关键时刻的宏观决策是科学的、正确的。我国经济发展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力回击了国际上“做空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硬着陆”等唱衰声音, 国内生产总值从 54 万亿元增长到 82.7 万亿元, 年均增长 7.1%,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11.4% 提高到 15% 左右, 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突破, 大踏步朝着多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结构调整目标前进。5 年来, 消费贡献率由 54.9% 提高到 58.8%, 服务业所占比重从 45.3% 上升到 51.6%, 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长, 实体经济结构显著改善。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 一些关键性、基础性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特别是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 解决了很多难点问题, 对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惠民生方面, 5 年来, 就业增长超预期, 城镇新增就业 6600 万人以上, 居民收入年均增长 7.4%, 贫困人口减少 6800 多万, 贫困发生率由 10.2% 下降到 3.1%,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 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 而且具有扎实的实践基础, 是深入把握中国经济规律、有效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构建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 是解决当代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总钥匙。

5 年来, 宏观经济领域的各项具体创新, 极大推动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创新。首先,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实施力度。其次, 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 创造性地将宏观调控目标扩展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统筹各类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第三, 破除西方危机管理的强刺激教条, 放弃“大水漫灌”的调控模式, 创造性地确立了区间调控思路, 明确经济增长合理区间, 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采取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等新举措。第四, 超越西方教条, 依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和经济改革目标实施短期宏观调控, 确保短期宏观调控保持战略定力、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局。第五,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 重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微观基础和制度环境。比如, 把宏观审慎政策作为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行的三大宏观经济政策之一; 创新货币政策工具, 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中间管控目标, 有效克服了过去简单依据外汇储备占存款发行货币带来的各种问题; 对地方债务融资总额设定上限, 加

强地方融资平台管控;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第六, 根据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求宏观调控不仅关注需求侧, 而且关注供给侧; 不仅着眼总量管理, 而且关注结构性问题; 不仅从一般性的政策实施入手, 而且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 不仅关注短期波动, 而且重视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和培育新动能; 不仅关注金融风险, 而且关注金融切实服务实体经济。第七, 形成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保证我们在进行宏观形势判断、宏观战略把握、宏观政策选择以及具体政策实施过程中把握好时度效。

以新思想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现了革命性创新。当前, 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提高宏观调控的战略性、系统性、协同性。要增强“四个意识”, 坚决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保护主义, 防止不切实际定目标, 更不能搞选择性执行。应在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定期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决定重大经济事项和中央财经委员会(领导小组)及时研究重大经济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及时研究经济领域改革问题等新制度基础上, 进一步探索党领导宏观调控的信息汇总体系、研究分析体系、决策体系和实施执行体系, 使之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下转 A2 版)